

《授經圖》抑或《授經圖義例》？

——文淵、文津二閣一本經學源流考的傳抄差異

黃明理*

（收稿日期：110年9月30日；接受刊登日期：111年1月9日）

提要

《四庫全書》史部目錄類經籍之屬，收有明朱睦㮮（1552-1587）所撰《授經圖》二十卷。此書作者雖標示朱睦㮮，然而曾經黃虞稷（1629-1691）、龔翔麟（1658-1733）大量增補，內容已非朱著之舊。由於對五經傳承源流的釐析具開創意義，四庫館臣仍對此書相當肯定。但書籍內容與「授經圖」之名未盡吻合，又因手抄數份，是以同此一書，前後閣本編纂者認知有異，今見此書的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書名不同，各卷內容也錯綜不一。

本文重點不在比較兩閣本是非優劣，而是思考編纂傳抄過程為何產生「同書異貌」的瑕疵？進而反思：為何作者不計較著作的命名？為何改動甚鉅的著作，標示原作者舊書名而不以為怪？另外，抄本未經精校，訛誤難免，《授經圖》中的焦點「傳授圖」，兩閣本正誤參差，除批評其謄錄品質外，還可如何正向看待？諸多問題，本文認為「讀者本位」的讀書態度實為關鍵，那存在於手抄傳播年代的習慣，視勘誤增補為讀者參與書籍的完成。如今倘能理解，並以此態度面對訛誤未淨的《四庫》抄本，則即使只利用複製影本，也能提供美好的閱讀經驗。

關鍵詞：手抄傳播、四庫全書、同書異貌、授經圖、讀者本位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未經檢出的校抄疏失

抄書，比起寫書撰文，簡單多了；然而，看似簡單，要抄得好卻也不易。從某個角度看，它比撰文難，因為原創文字的作者沒有一個「原本」必須遵從，抄書者卻以完整複製為目標，一字一句都受到規範，不得隨意變改。其實，撰文、抄書，層次不同，卻都是人類文化得以累積的重要活動。在印刷技術尚未發明、尚未普及之前，抄寫，是書籍傳播流布的不二法門，珍貴的原著不經一再謄抄，裨補社會的作用實在有限。

而大凡值得形諸文字的內容，通常不只三言兩語，大量的信息經過轉抄，難免滋生遺漏、筆誤、重複、顛倒、增替……等等訛舛，陳繼儒（1558-1639）曾說：

余得古書，校過付抄，抄後復校；校過付刻，刻後復校；校過即印，印後復校，然魯魚帝虎百有二三，夫眼眼相對尚然，況以耳傳耳，其是非毀譽寧有真乎？¹

傳抄書籍，有時因書況不佳，以致難辨而誤認；有時因抄寫者迷糊，誤書形近或諧音之字；也有因異體字而生困擾，蓋漢字自初文經過演變，一個字不只一個字體字形，書寫過程又因俗因人孳生異體，眾多相異字形有的通行、有的冷僻，冷僻者一般人不認得，抄寫時便容易誤以為他字。陳繼儒所謂「魯魚帝虎百有二三」，「魯」「魚」之訛，是因單純的破損而誤書，至於兩個差異頗大的「帝」、「虎」楷字，理應不疑，但實際情形卻是：虎字的隸書、行書、異體楷書中有形近於「帝」的，導致錯認。

這些書籍狀況、寫手能力、文字字樣書體等影響因素，使得傳抄很難完全無誤，也因此，抄刻前後的校對勘誤，必須再三仔細。

清代乾隆朝《四庫全書》編纂工程，卷帙浩繁，應繕圖書數以萬計，動用謄錄專員、校對文官成百上千。預計抄入的書籍，自翰林四庫館提調出來，交與分校官，分校官校正底本、題簽意見、提示格式後，派發給謄錄生員抄寫；謄錄生抄寫好的內容，交復校官校簽再經謄正，待書籍抄校完畢，即與底本歸還提調處。²抄、校的程序，略如陳繼儒所言，但趕進度的抄校結果，裝帙上呈的書籍，訛誤仍俯拾可得，乾隆四十三年（1778）五月皇帝（1711-1799）曾因此動怒，指責臣下：

¹ 明·陳繼儒：《巖棲幽事》，收入《叢書集成簡編》第22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頁13。

² 見張升：《四庫全書館研究·四庫館的運作》（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01-102。

昨辦書期屆五年，將校對謄錄諸人優予議敘，用示勸揚。惟是進呈各書，朕信手抽閱，即有訛舛，其未經指出者尚不知凡幾？既有校對專員，復有總校、總裁，重重覆勘，一書經數人手眼，不為不詳，何竟漫不經意，必待朕之遍覽乎！若朕不加檢閱，將聽其譌誤乎？³

此後全書處展開陸續的檢核，按季呈報檢查出的訛錯，以及職責所在官員的懲處，一系列作為目的應是：宣示朝廷的重視，希望抄、校工作可以更踏實。但已完成的書籍，通過既定校對、總校、總裁等職司層層把關，若要從頭全面精校，勢必影響整體工程的後續運作，而原分工系統並無覆勘這一環節，臨時交辦，人手時間諒難充裕——徹底檢校，事實上辦不到。所以按季呈報訛錯，宣示意義大於普查重勘。重校覆勘的實況，恐怕只比乾隆「信手抽閱」再擴大些範圍，止於翻閱抄成之圖書，而非再次比對底本那般嚴謹。這可從奏摺中列出的訛錯看出端倪，例如：牒訛謀、凌訛陵、元訛光、憐訛隣、江總之總訛摠、謝朓之眺訛眺、「斗酒雙柑我自持」句持訛攜、「況爾我之甥」句甥訛生、「旱」字寫不成字、「瀟」字寫不成字、癡訛從俗做痴、「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論」二句脫寫一「故」字、「見景帝殺御史大夫晁錯」句脫一「帝」字……⁴連篇累牘盡是別字與漏失，以及一些增筆缺筆類的錯字（不便以印刷字樣舉似者），飽讀詩書的四庫館臣，直接翻讀書籍即可挑揀出來。倘若從容為之，挑出的錯誤，必不只奏摺清單羅列的那些。

然而，抽閱抄本的檢查方式，儘管能查察錯別字、遺漏、冗增之類的疏失，但一些必須比對底本才能發現的錯誤，便依然存在。

史部目錄類經籍之屬，《四庫全書總目》載明朱睦㮮（1552-1587）所撰《授經圖》二十卷，為兩江總督採進本。⁵然同此一書，最先完成的文淵閣本書名是：《授經圖義例》⁶，完成在後的文津閣本標作《授經圖》⁷。二閣本書前〈提要〉除書名不同及少數抄寫出入

³ 張書才主編：〈諭內閣嚴飭總裁等嗣後務宜悉心校勘毋再因循干咎〉，《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06件，頁836。

⁴ 上舉實例，取自《纂修四庫全書檔案》第649件乾隆44年10月〈全書處彙核七至九月繕寫訛錯奉旨記過之總裁等清單〉、第706件乾隆45年7月〈全書處彙核四至六月繕寫全書訛錯及總裁等記過清單〉，分布在張書才主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頁1112-1113、頁1189。類此清單檔案，尚有第632件、650件（蒼要處）、749件、817件、851件、852件、875件。

⁵ 清·永瑤、紀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第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85，頁763。

⁶ 見明·朱睦㮮撰：《授經圖義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7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頁231起。校呈時間是乾隆46年11月。

⁷ 見明·朱睦㮮撰：《授經圖》，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675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頁1起。校呈時間是乾隆49年11月。

外，⁸解說、資訊是相同的，開頭都是：「臣等謹案《授經圖（義例）》二十卷，明朱睦㮮撰，睦㮮有《易學識疑》已著錄，是編所述經學源流也。」同一著作無疑，但進一步比對，兩本卷次內容竟又互相錯綜：

文淵閣本《授經圖義例》，卷 1 至卷 4《易》，卷 5 至卷 8《書》，卷 9 至卷 12《詩》，卷 13 至卷 16《春秋》，卷 17 至卷 20《三禮》。

文津閣本《授經圖》：卷 1 至卷 4《易》，卷 5 至卷 8《詩》，卷 9 至卷 12《書》，卷 13 至卷 16《三禮》，卷 17 至卷 20《春秋》。

這種情況很不利於援引。兩閣本這同一本書，當一人引舉《授經圖義例》卷 5 以後某卷的內容，而他人持《授經圖》以查索，所見將是南轅北轍，勢必懷疑引述者誤引、或是標示卷次不實。相信書籍作者、使用者，都不樂見如此情況。然而，當負責詳校覆勘的館臣抽閱此書——不管淵閣本或津閣本，他未必能發現書名不同、卷次舛錯，原因是：此書並不普及，檢閱時無底本對照，如常的書名與卷次，實無從發現問題。因此，這同書而異名異貌的寫本，未被檢出，分藏別閣度過了兩百多年。

令人好奇的是，前後兩閣抄錄者，既是一個底本，閣本書前提要、《總目》提要也大同小異，但，究竟是原書存有的不確定性？抑或謄錄者擅改？還是纂修、分校官員的學術修正？造成同書異貌的原因，值得進一步推敲。

二、為何同書抄出異貌？

《四庫全書》七閣本都由手抄，雖然板式統一，字體要求楷正，但經由手寫，即使同一書手，書跡也不免前後稍別。所以，列入筆跡觀察，《全書》裡每一冊圖書都是獨一無二的；同著作的七個抄本，基本上風貌各異。惟此乃手寫的常態差異，是廣義的「同書異貌」；在此之外，本文特別關照的，更在書名不同、卷次舛互等大差異，不常見的狹義「同書異貌」。

《授經圖》的淵、津兩閣抄本，彼此互異，至少有一本未忠於底本。而會是誰改變原著面貌呢？

⁸ 文淵閣本〈提要〉引朱書稱「周、漢而下至金、元，作者凡一千一百三十二人」，文津閣本作「一千一百二十三人」，是較大差異，其餘修辭之異，不構成內容差池。明·朱睦㮮撰：《授經圖義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231。明·朱睦㮮撰《授經圖》，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1。

(一) 纂修官校正的可能性高

實際關係著傳抄作業的，除謄錄人外，還有負責纂修、校勘的館臣，而此三者中，謄錄人最不可能大改原書。謄錄，以在京活動的監生、舉人為主，⁹他們儘管科舉失意，學問卻不容小覷，若謄錄時有意更動改訂內容，也非全無可能。不過，畢竟身處《全書》人事編制中的最底層，他們所抄進度、內容與品質，上有分校官監督考核，而抄書成績，關係著未來是否得以議敘官職。論情論理，擅改書名、調動卷次的作為，對自己有害無益。

再就兩閣本的筆跡來看，也可規知謄錄不會是蓄意變動者。《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中《授經圖義例》一書，卷1至卷4、卷5至卷12、卷13至卷17、卷18至卷20各裝一冊，四冊首頁登載的謄錄監生都是王鈺。¹⁰但比對這二十卷書跡，並不一貫，卷1、2、3、4、12相近，卷5、6、7、8、9、13、14、15相近，卷10、11相近，卷17、18、19、20相近，卷16獨樹一幟，大約有五種寫字風格，如【圖1】所示，整本書不是單一寫手抄成。



【圖1】

說明：字跡由左至右分別取自卷1、5、11、16、20。

⁹ 參黃明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謄繪人名錄與辨析〉，《中國學術年刊》第36期春季號（2014年3月），頁45-92。

¹⁰ 見明·朱睦㮮撰：《授經圖義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75冊，頁231、255、289、315。

重心顯然在於對原書的評述與校勘，議定各書未來在《四庫全書》中的位置與理想形貌。

由此觀之，決定朱睦㮮此書書名、卷次安排者，應即負責該書的纂修官。不過，追索可能人選，不妨更全面些，可能性稍高的尚有分校官。分校官主要責任是監督新繕圖書精確如式。每一個分校館臣有若干員謄錄可供派用，並且施予考核。具體的工作在：接獲發繕圖書後分派謄錄抄寫，按規定校正每一份謄抄的內容。然而，在抄、校過程中，分校官被鼓勵對原書進行校正，若發現可議，簽處得宜而獲得認肯，落實修正，他們可因此記功，列入考績。¹⁴有此類似補苴的機制，那麼書籍的書名、卷次由分校提出調整，也不無可能。只是簽處意見畢竟還得經過纂修官裁衡，準此，則名義上終究是纂修官的更改。至若分校官無視獎懲措施、逾越正常程序，直接下令謄錄生改動圖書，可能性恐怕微乎其微了。

變改朱書底本面貌的環節落在何處，已呼之欲出了，只是證據不夠確鑿。所幸，事過境遷，今日也無必要追究致生困擾之人之責。且放下追問，換個問題思索：這本書為何在書名、卷次等不應有疑之處，讓編纂館臣舉棋不定？館臣不應不知一書兩名卷次不一必生困擾，但，究竟何故而任其發生？

（二）混雜的著述，猶疑的書名

檢視朱睦㮮此書，其實「授經圖」或「授經圖義例」之名，皆不足概括書籍內容。

書凡二十卷，五經各佔四卷篇幅，每經首卷乃作者綜談整理該經傳授分派的原則；次卷即以縱橫線系連傳承師隸的名姓，以簡圖表示經術傳授梗概；再次卷題為〈諸儒傳略〉，¹⁵羅列傳授圖中諸人小傳，不詳敘生平，只聚焦經學相關的資訊，或是出處大節，事蹟缺乏者則附記姓氏爵里於相關人物傳下；末卷蒐羅諸儒著述、歷代傳注，分類登載書目卷數。整本書的架構如此，故四庫列為「目錄」之類。此書若命名為「授經圖」，圖的概念，顯然僅符應各經的圖表卷，其餘非圖各卷，首卷勉強算作圖的附帶說明，至於傳略與著述兩卷，便非「授經圖」概念所能涵蓋。至若命名為「授經圖義例」，則涵蓋範圍更小，因為：「義例」一詞附庸於著作，五字所表達的，是為「授經圖」發凡起例；是編制「授經圖」的體例原則、說明文字。以此五字為書名，概念只能與各經首卷內容稍稍呼應，更顯名實不符。

此書在各經首卷有簡扼文字，體例上乃針對該一經傳授之圖而發，不是剋就整本書的說明。但第一卷，繫在《易》下的義例，卻有 6 則言論是籠罩整本書的發言，文字如下：

¹⁴ 參見張升：《四庫全書館研究》，頁 182-185。

¹⁵ 文淵閣本以「諸儒傳略」四字題於此卷卷首，卷 3、卷 7、卷 11、卷 15、卷 19 皆然，而文津閣則無此題目。

禮：擬人必以其倫。漢諸帝能從師受經，至美也。美而不錄，不可與儒生儕也。不可儕，故殊之；殊之者，尊之也。

諸儒傳，有關經學則詳，否則識其出處大節而已；事實鮮少不可為傳者，附其姓氏爵里於諸傳內以見之。

諸儒有通四經五經者，傳祇一見，餘皆繫名於各派之下，覽其圖則自知矣。

舊圖授受非的派者不錄：《書》十七人、《詩》十九人、《周禮》二人。移置別派者，《易》三人、《詩》四人、《禮》一人。

舊圖所遺者，余據註疏及《史》《漢》諸書補入，《易》二十九人、《書》二十八人、《詩》十四人、《春秋》三十三人、《禮記》一人、《周禮》十一人。

諸儒經解，非有作者姓氏不錄。錄之或因人以存其書，或因書以彰其人，周、漢而下至金、元，作者凡一千一百三十二人，國朝三十九人。經解凡一千七百九十八部，二萬一千七十一卷。¹⁶

此卷《易》學傳授的文字僅僅3則，上舉內容卻超出一倍。揆其文義，這6則是對整部書立說，符契所謂的「授經圖義例」。第一則說明圖示傳授系譜不列入帝王的原由；第二、三則說明諸儒傳記詳略的取捨標準；第四、五則清楚交代此書前有所本，「今圖」對「舊圖」有所刪補改易；第六則說明整部書總錄各經經解作者與著作數目。不可不注意的是，這一則著錄經解作者數與著作數的總報告，底下以小字注曰：「新增入古今作者二百五十五人，經解凡七百四十一部六千二百一十八卷。」小字敘述著錄經解的異動，言說之人，顯然不是6則義例的作者朱睦㮮，而是後繼者。

這是一本狀況複雜的書，書名猶疑，「作者」不一。署名朱睦㮮所撰，卻又有後繼者，後繼者新增的內容數非淺淺，以經解作者而言，在1171（1132+39）人外，增入255人，數量成長兩成；以經解著作而言，在1798部外，增添741部，增添更達四成以上。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對此有清楚的掌握，案曰：

《崇文總目》有《授經圖》三卷，敘《易》、《詩》、《書》、《禮》、《春秋》三《傳》之學，其書不傳。宋章俊卿《山堂考索》嘗溯其宗派，各為之圖，亦未能完備，且頗有舛訛。睦㮮乃因章氏舊圖而增定之……舊無刊板，惟黃虞稷家有寫本，康熙中虞稷乃同錢塘龔翔麟校而刻之。虞稷序稱：「西亭舊本（案西亭，即睦㮮之

¹⁶ 明·朱睦㮮撰：《授經圖義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75冊，頁235。明·朱睦㮮撰：《授經圖》，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675冊，頁5。

別號)先後不無參錯,予與龔子衡圖重為釐正,《易》則以復古為先,《書》則以今文為首,其他經傳之闕軼者,復取歷代史〈藝文志〉及《通志》、《通考》所載咸為補入,而近代傳註可傳者亦間錄焉,視西亭所輯庶幾少備」云云……則虞稷等大有所竄改,非復睦樛之舊矣。¹⁷

這些資訊乃從書中朱睦樛、黃虞稷(1629-1691)的序獲致,前者寫於明神宗萬曆元年(1573),後者之序未記時日,要之不晚於清康熙30年(1691)。原來,《授經圖》是北宋《崇文總目》(書成於仁宗慶曆元年,1041)著錄之書,書已失傳,南宋章如愚(字俊卿,?-?)溯源宗派重為之圖,時間在寧宗朝(1195-1224),收在《山堂考索》,「考索」的名義,標示其恢復前人著作的目的,因此,沿襲舊書名,其情可理解。然而,經過三四百年,朱睦樛以章書為基礎,修補五經傳授圖,並增列傳記書目,儼然編成另一著作,卻未替新書命名;又過百年,黃虞稷、龔翔麟(1658-1733)大舉增補,規模已「非復睦樛之舊」,卻仍延續舊名,且保留朱睦樛為書籍作者。

朱、黃、龔等人無疑是孔子「述而不作」觀念的服膺者,尊前人整理經學傳授的創舉,保存始揭「授經圖」之名以榮耀前人,而謙遜自己不過踵事增華從事補苴罷了。然而,顧此失彼,以致忽略標示書名與作者的重要性,那沿襲的舊書名,無法承載新的結構與內容;那掛名的前作者,無法為後來添入的文獻負責。不隨時制宜以改動書名、作者的保守作法,終使著作暴露名實不符的窘態。¹⁸

《四庫全書》收入的是黃、龔刊刻之書,卷前有朱睦樛、黃虞稷之序,標題都是〈授經圖義例序〉,淵閣本、津閣本皆然;緊接二序之後,津閣本錄有朱勤葵〈授經圖義例跋〉,而淵閣本則置此跋於書末。¹⁹然則,文淵閣本將此書定名為《授經圖義例》,纂修官應是承黃虞稷刊本而下的決定。

¹⁷ 清·永瑤、紀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第2冊,卷85,頁764。

¹⁸ 四庫館臣在提要末了云:「虞稷等乃雜採諸家以補之,與睦樛所見正復相反,然朱彝尊《經義考》未出以前,能條析諸經之源流,此書實為之嚆矢,正不以有所點竄,並其原書而廢之矣。」提要乃對明朱睦樛《授經圖》而作,但此中「此書」所指卻是黃、龔補修後之書,「原書」才指已被融入「此書」的朱氏舊著。清·永瑤、紀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第2冊,卷85,頁764。

¹⁹ 序中云:「是集(案:指朱睦樛書)未經鏤版,黃徵君俞邵向藏寫本,龔主事衡圖、高舍人澹人刻之白下。」見明·朱睦樛撰:《授經圖義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75冊,頁233。明·朱睦樛撰:《授經圖》,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675冊,頁3。俞邵即黃虞稷,衡圖即龔翔麟,高澹人為高士奇(1644-1703),他們根據黃所藏朱書寫本,整理之後刊刻於南京。然朱書其實明萬曆二年已付梓,見於朱勤葵〈授經圖義例跋〉。明·朱睦樛撰:《授經圖義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75冊,頁333。明·朱睦樛撰:《授經圖》,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675冊,頁5。

但，如前所述，「授經圖義例」五字的概念無法涵蓋全書，書以之為名並不妥適。而且，朱勤萑的跋文開頭即云：

《授經圖》二十卷，乃家君所著，藏之笥中久矣。癸酉（案：明神宗萬曆元年，1573）秋，萑於講習之暇請附諸梓，因敘其大略云。²⁰

稱朱睦㮮所著書，並非《授經圖義例》，而是《授經圖》。²¹可以推測：是後來四庫纂修官發現此中差異，才在後出的閣本作了更改。²²

只是，後來的修訂，並未對已度藏的文淵閣本進行挖補改動。而此時既知書有疑名，竟未進一步思索：放棄「授經圖義例」之名，選用「授經圖」是否就妥當無疑？何況歸類此書為「目錄類」，二書名都未能直接與「目錄」產生聯結，何不趁編纂《全書》之便加以平議，重新命名？舉棋不定，只能留下迷惑了。

（三）五經序列的不同習慣

此書兩個閣本的五經排列卷次不同，淵閣本依序是《易》、《書》、《詩》、《春秋》、《三禮》；津閣本則是《易》、《詩》、《書》、《三禮》、《春秋》。二者都以《易經》為首，差異在《書》、《詩》的先後，與《春秋》、《三禮》的先後不一致。如此的相異列序，並不牽涉經今古文學派主張的問題。經學史家周予同（1898-1981）云：

對於經的次第，「宋學派」及「新史學派」無甚意見，但今古文學派卻仍是爭辯不決。

六經的次第，今文學派主張 1《詩》、2《書》、3《禮》、4《樂》、5《易》、6《春秋》。而古文學派主張 1《易》、2《書》、3《詩》、4《禮》、5《樂》、6《春秋》。他們兩派除在為行文便利而偶爾顛倒外，絕不隨

²⁰ 明·朱睦㮮撰：《授經圖義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333。明·朱睦㮮撰：《授經圖》，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5。

²¹ 莫友芝（1811-1871）《宋元舊本書經眼錄》得以印證，該書卷 1 記載：「《授經圖》二十卷（萬曆二年朱氏原刊本）。此朱中尉西亭氏原本，康熙間龔蘅圖因以重刊，黃俞邵校之，頗有增訂……此明刊未經校補者。四庫謂無刊本以龔刊著，則未見此本也。」顯示萬曆刊刻書名並無「義例」二字。清·莫友芝：《宋元舊本書經眼錄》，收入《書目叢編》第 12 冊（臺北：廣文書局，1988 年），附錄卷 1，頁 14。

²² 早於文津閣，文淵閣本已有反應，此書題《授經圖》，乾隆 47 年 10 月校上。見金毓黻：《金毓黻手定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提要》（北京：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9 年），卷 46，頁 377-378。

便亂寫。²³

《授經圖》的經典次序，顯然不屬今文學派，但與古文學派五經的序列（《樂》排除）還是有些微不同，淵閣本差別在《春秋》居《三禮》之前；津閣本差別在《書》排在《詩》之後。

其實，如同今文學派以《詩》為首的經序，早在《莊子》、《春秋繁露》、《史記》中的敘述即已存在；而古文學派以《易》為首的序列，雖出現較晚，但也見於《漢書·藝文志》、《漢書·儒林傳》，以及《說文解字·序》。²⁴朱睦㮮著書時未擇從今古文家之慣例，實另有根據。所撰〈授經圖義例序〉有言：

余觀《崇文總目》有《授經圖》，不著作者名氏，敘《易》、《詩》、《書》、《禮》、《春秋》三家之學，求其書，亡矣；及閱章俊卿《考索》圖，六經皆備，間有訛舛，余因考之。

此段文字中的經序，實按照《崇文總目》的敘述，²⁵而從他「余因考之」的語氣判斷，因襲此經序並反映在書籍卷次排列上，大有可能。生年稍早於朱的何良俊（1506-1573），其《四友齋叢說》經說卷云：「孔子贊《周易》，修《詩》《書》，定《禮》正《樂》，作《春秋》。」²⁶經序相同，著眼孔子參與述修六經的淺深程度，由贊—修—定—正—作的措辭，最能點出此經序安排的內在理路，而《詩》置《書》前，曰「修詩書」不曰「修書詩」，更可能取決於口吻的利便。可見這樣的經序，明代學者並不陌生、也不排斥。津閣本《授經圖》卷次安排如之，不為無據。

然而，淵閣本的《授經圖義例》，依《易》、《書》、《詩》、《春秋》、《禮》的次序，也未必全無出自朱睦㮮的可能，因為這種順序盛行於明代。明代科舉中五經試士，敘及五經，順序大致如此。《明史·選舉志》云：

²³ 周予同：《群經概論·導論》（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89年），頁8。篇中並解釋兩學派排序差異之因，在於：古文學家視孔子為文化保存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整理六經按史料產生早晚為序，故伏羲之書最先；今文學家視孔子為教育家、哲學家、政治家，重微言大義，六經依內容程度由淺入深，故《詩》、《書》居前。見周予同：《群經概論》，頁12-13。

²⁴ 參見前引周予同：《群經概論》，頁8-9。

²⁵ 宋·王堯臣：《崇文總目》卷二云：「《授經圖》三卷，闕，不著撰人名氏，敘《易》、《詩》、《書》、《禮》、《春秋》三家、《論語》、《孝經》之學，師承相第系而為圖。」見宋·王堯臣：《崇文總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7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卷2，頁22。

²⁶ 明·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1，頁1。

科目者，沿唐、宋之舊，而稍變其試士之法，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²⁷

此段文字稍後，交代朝廷頒發的科舉定式，初場經義文考試所根據的傳註，也依《易》、《書》、《詩》、《春秋》、《禮記》的順序。《明史》雖然是清朝纂修，但關於科舉制度的敘述，必是前承明朝制式講法。再以明代科舉學政官員談及五經考試為證：孝宗弘治17年（1504），王守仁（1472-1529）應聘為山東鄉試考試官，事後書寫〈山東鄉試錄序〉，序後附「山東鄉試錄」，刊載當年三場考試的題目與程文，其五經義各錄二道題文，第一篇出自〈乾卦文言〉、第二篇出自〈繫辭上〉、第三篇出自〈仲虺之誥〉、第四篇出自〈立政〉、第五篇出自〈小雅·采薇〉、第六篇出自〈魯頌·閟宮〉、第七篇出自宣公十一年事、第八篇出自昭公五年事、第九篇出自〈禮器〉、第十篇出自〈緇衣〉，排列順序即如朝廷功令中的五經序列。²⁸

科舉法定的五經序列，影響自不容小覷，明代學者文集中關於五經的論述，編排次序往往也遵從勿替。例如焦竑（1540-1620）《澹園集》經籍志論，經部11首，排序即是：《易》、《書》、《詩》、《春秋》、《禮》、樂、《孝經》、《論語》、《孟子》、經總解、小學；²⁹又如顧炎武（1613-1682）《日知錄》，以經學居首，因此，其書卷一至卷八，即依序記錄其讀《易》、《書》、《詩》、《春秋》、《禮》之心得。³⁰洎至清代，錢大昕（1728-1804）《潛研堂集》中的經學答問，此一序經習慣亦仍可見。³¹而清社既屋，由遺老編纂的《清史稿》，言及科舉，亦謂：「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謂之制義……四書主朱子集註，《易》主程傳、朱子本義，《書》主蔡傳，《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胡安國傳，《禮記》主陳澧集說。」³²

由此觀之，生當明季的朱睦㮮、黃虞稷，都有可能採取這樣的經序以編排書中卷次。即使到了清初，學者文人對此猶是習以為常，《四庫》第一份《授經圖義例》抄本，便順此而作。

²⁷ 清·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卷70，頁1693。

²⁸ 明·王守仁：《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卷22，頁841-854。

²⁹ 明·焦竑：《澹園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卷23，頁297-303。

³⁰ 明·顧炎武撰，徐文珊點校：《原抄本日知錄》（臺北：臺灣明倫書局，1979年），頁1-182。

³¹ 清·錢大昕：《潛研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卷4-8，頁52-117。

³² 1960年張其昀等據《清史稿》纂修為《清史》，〈選舉志〉無大更張，據以引之。張其昀等編：《清史》，收入《仁壽本二十六史》（臺北：成文出版社，1971年），卷109，頁37028。

回到本文的問題，扣問淵、津閣本前後臚錄，為何《易》之外的四經次序不統一呢？這與《四庫全書》整理圖書的基本性質，有一定關係。

彙編天下圖書，必然存在對整體文獻的分類架構。五經圖書，編錄於何部何類，排列順序孰先孰後，四庫館臣當有所規劃。由《四庫全書總目》可見，四部中經部居前，經部中《易》類居首，其次則《書》類、《詩》類、《禮》類，再次為《春秋》類，次序遵循源自漢劉歆（前 50-後 23）《七略》的古文學派習慣。今觀文淵閣本、文津閣本，館臣不以此經序強加於《授經圖義例》（《授經圖》）上，基本上體現尊重文獻的態度，然而，書中五經序列有別於四庫圖書架構，不免也會引起館臣注意。

可以合理推測：著手在先的文淵閣本，臚錄《授經圖義例》時，對書中經序有別於四庫規劃，不覺困擾，即照黃虞稷刻本直錄；其後纂寫文津閣本（文源閣本已毀、文溯閣本未見影印，姑且不論），四庫館規劃的五經序列已更形鞏固，纂修者敏感察覺：黃虞稷刻本經序既與四庫館有異，又與作者朱睦㮮序文所揭不同——三種五經排列方式同時湊集，而彼此又只是些差微別，頓生雜亂感。為整齊雜亂，即取書前朱〈序〉中的順序為準，動手調整了底本的五經卷次。至於已裝潢貯藏的文淵閣本，予以翻修有一定的難度——於是，前後異貌便無可避免了。

三、兩閣本「授經圖」誤筆互有不同

朱睦㮮這一著作，書名、卷次差異如此之甚者猶能並存，則書中文字抄錄存在彼此出入現象，也就無需訝異。從書名來看，本書焦點必在經學傳授之圖，但兩閣本的圖示，並沒有因其重要性而將訛誤減至最低。

「授經圖」，顧名思義就是以圖簡示儒學經典傳授譜系；圖示方法，是以經學家名字為主，在名字上下以縱線表示承先傳後，並輔以橫線左右系連同一世次的關係者姓名。縱橫線組織人名，構成之圖可以以簡馭繁，省去言說口述，而表達傳承關係、世系派別。但名字只是符號（圖中有些人物姓氏還承上省略），縱橫線是更簡單的線條，與屬詞比事有物有序的文章大不相同，抄寫時稍一分神，便易生舛錯。而名字訛誤，所指即非其人；縱橫線錯漏，關係即生疑竇，指涉資訊不明確，徒生困惑。這理應精確圖寫，再三校對的簡圖，可惜淵、津兩閣本都做得不盡理想，其出入情況分述如下：

（一）易經傳授圖（如【圖 3-1】、【圖 3-2】³³）

人名部分，第六世田何，淵閣本誤作「由何」；第八世主父偃，津閣本誤作「王父偃」；第十世白光，津閣本誤作「曰光」。兩閣本最大的差異是：費直一系，淵閣本圖四世六人，津閣本則闕。

系連部分，第九世施讐，上承衡胡，下傳戴賓、張禹、魯伯同世三人，淵閣本在施讐上縱線加一橫線左行，卻無所系者，³⁴津閣本則無此橫線；施讐下傳，第十一世同世彭宣、戴崇、毛莫如、邴丹，四人橫線相系，橫線上淵閣本兩豎線分系於張禹、魯伯，而津閣本唯一豎線系為張禹所傳。³⁵

另外，京房有二人，卷一義例特別提出：「其一頓丘人，其一不知何許人，皆以易學顯。為太中大夫者，顏師古謂書字誤耳，不當作京房。今圖並存以備參考。」³⁶其一上承楊何，與施讐、孟喜、梁丘賀同在第九世。另一京房，淵閣本圖置之於孟喜、焦贛之下，津閣本位置相同，但焦、京之間無豎線相連。又此京房之下，淵閣本有橫線系連同世姚平、殷嘉、乘弘、任良四人，但與京房間亦無豎線；津閣本於橫線上則有豎線，但未與他名相連系。³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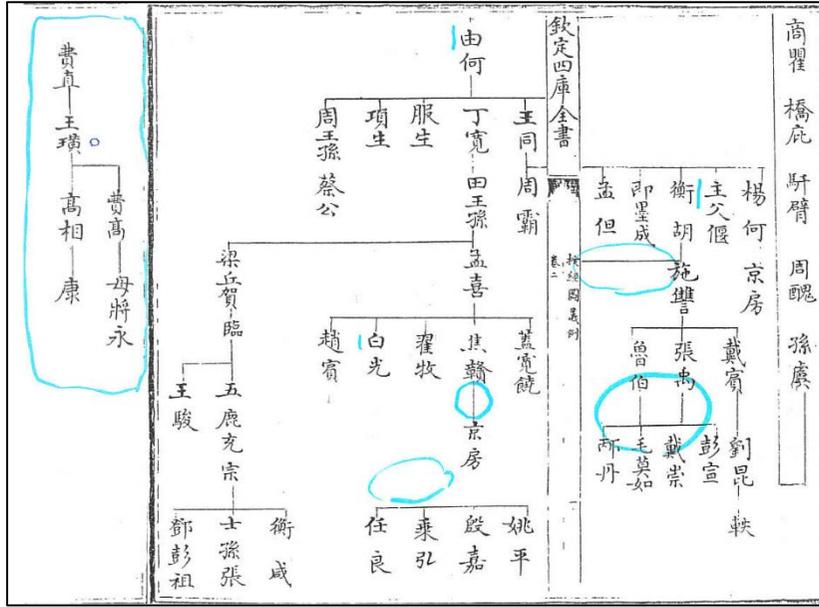
³³ 圖上圈畫記號為筆者所加，以指點訛異之處；另為整齊圖表，原書空白處略予刪削，非原書原貌。特此註明，其餘四經傳授圖亦同。

³⁴ 據〈諸儒傳略〉可知：施讐，從田王孫受易，與孟喜、梁丘賀並為門人。見明·朱睦㮮撰：《授經圖義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238。明·朱睦㮮撰：《授經圖》，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7。所以，橫線左行應與孟喜相接，表示同出自田王孫，蓋因跨頁而失連。其學非承自衡胡，名上系連於衡的縱線訛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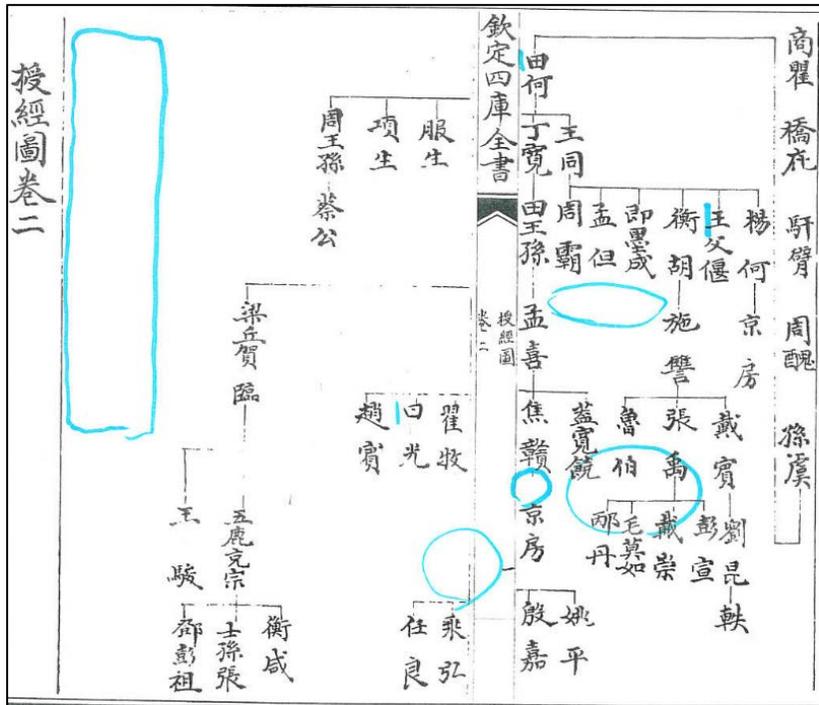
³⁵ 〈諸儒傳略〉張禹、彭宣自有傳，魯伯、戴崇、毛莫如、邴丹附在施讐傳下，諸人傳授關係乃：張禹授彭宣、戴崇；魯伯授毛莫如、邴丹。見明·朱睦㮮撰：《授經圖義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238。明·朱睦㮮撰：《授經圖》，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8。圖示戴崇與毛莫如間不應橫連。淵閣本誤在橫線；津閣本橫線之誤外，又失上系魯伯之縱線。

³⁶ 明·朱睦㮮撰：《授經圖義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235。明·朱睦㮮撰：《授經圖》，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5。

³⁷ 據〈諸儒傳略〉四人皆自京房出，見明·朱睦㮮撰：《授經圖義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240。明·朱睦㮮撰：《授經圖》，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10。四人之上須有縱線系連京房。



【圖 3-1】



【圖 3-2】

（二）詩經傳授圖（如【圖 4-1】、【圖 4-2】）

傳授圖略分毛詩、魯詩、齊（轅固）詩、韓詩四系，及別派。³⁸

人名部分，齊詩、韓詩二系兩閣本都無出入；毛詩系首子夏，淵閣本標「卜商」，津閣本僅記「商」名，不算訛誤。多有出入的是魯詩系，以及別派。

魯詩申公下傳同世十二人，其中之徐公，淵閣本下系王成，王成又下系唐長賓等人，津閣本失此關聯並且無王成之名。³⁹與唐長賓同世者，淵閣本有「玄賢」，津閣本則作玄成，乃韋賢之子，必是淵閣本筆誤。此世張長安授子（張）游卿，游卿之下，淵閣本無傳人，津閣本則有王扶；津閣本王扶同世者又有許宴，上承與張長安同世的褚少孫，而淵閣本亦闕之。⁴⁰

別派圖，淵閣本高嘉下系（高）容，容下有縱線而無所系，津閣本則系有（高）詡；淵閣本右師細君下系「包成」，津閣本作包咸為是。⁴¹

系連部分，兩閣本在毛詩、韓詩、別派一致，有出入處在魯詩、齊詩二系。魯詩王式學的傳承，人名出入處已討論如上，但淵閣本圖中卓茂、（韋）玄成、韋賞、薛廣德、唐長賓、張長安、褚少孫同世七人橫線相連，而縱線上承博士江公與王式，七人出自二家，看不出具體傳承，不無問題。經查次卷〈諸儒傳略〉可知：卓茂與韋玄成（誤作玄賢）間應斷連、韋賞與薛廣德間應斷連。蓋卓茂上系博士江公，韋玄成、韋賞上系韋賢，薛、唐、張、褚四人上系王式，才是傳略顯示的資訊。津閣本圖七人橫線相連上承博士江公，亦誤。由此看來，淵津兩閣本一致的系連，都還可能有問題。比如兩閣本圖皆韋賞下系龔舍、薛廣德下系龔勝，其實，傳略顯示二龔同師薛廣德，兩人間宜系橫線，而龔舍上系於韋賞者，有誤。⁴²根據傳略又可發現：津閣本圖許晏系在褚少孫之下，不確，應與王扶橫線相連，上承（張）游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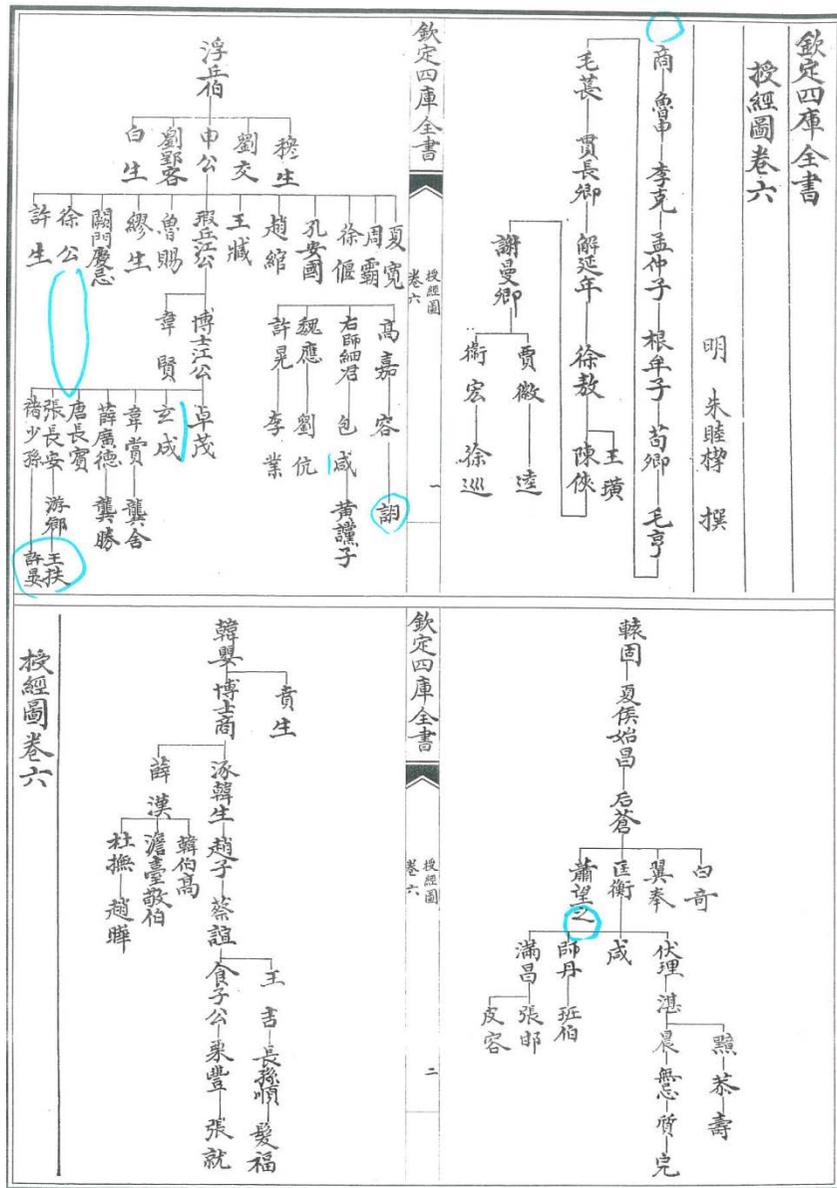
³⁸ 義例有言：「毛詩謝曼卿；魯詩高嘉、右師細君、魏應；韓詩薛漢。雖無師承而傳有次第，姑識之，以備咨考。舊圖許晃受詩申公傳李業，按《漢書》：申公高帝時人，許晃平帝時人，相去甚遠，非的傳，故置別派。」明·朱睦㮮撰：《授經圖義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273。明·朱睦㮮撰：《授經圖》，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24。

³⁹ 王成乃王式之誤。據〈諸儒傳略〉王式事徐公及許生，見明·朱睦㮮撰：《授經圖義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277。明·朱睦㮮撰：《授經圖》，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28。淵閣本誤名，津閣本失載。

⁴⁰ 據〈諸儒傳略〉王扶、許晏皆張游卿門人，見明·朱睦㮮撰：《授經圖義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278。明·朱睦㮮撰：《授經圖》，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29。淵閣本失載。

⁴¹ 見明·朱睦㮮撰：《授經圖義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274。明·朱睦㮮撰：《授經圖》，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25。

⁴² 見明·朱睦㮮撰：《授經圖義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277、278。明·朱睦㮮撰：《授經圖》，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28、29。



【圖 4-2】

(三) 書經傳授圖 (如【圖 5-1】、【圖 5-2】)

此經傳授圖，兩閣本的差異不大。經分古、今文，故學派世系分別圖示，今文世系圖置前、古文世系圖在後，惟淵閣本只標「古文」，今文圖前無標目；津閣本則均有標目，然「今文」二字只見右半字——此牽涉文津閣本《四庫全書》現代複製的問題，容待後文討論。

人名部分，今文學第二世鼂錯，淵閣本鼂不成字（缺旦字下橫），津閣本則寫作通用字「晁」；歐陽學（曹）「社」，淵閣本誤書為（曹）「社」。淵、津閣本相同而可疑的人名，有今文學與夏侯建同世的「孔霸」。古文學傳授亦有（孔）霸，學承其父（孔）延年，延年則學自叔父孔安國，乃古文派之始。查考〈諸儒傳略〉，古文派孔氏父子合為一傳，未見孔霸別有今文學傳承；而今文學夏侯勝弟子未見有「孔霸」其人。⁴⁴

系連部分，今文夏侯學夏侯建授張山拊，張山拊授秦恭、鄭寬中、張無故、李尋、假倉同世五人，津閣本縱橫線清楚標示，淵閣本張山拊之下縱線不明顯。今文歐陽學傳至歐陽歛，授曹曾、高獲、禮震，⁴⁵三人同世，津閣本世系清楚，淵閣本則誤將高獲、禮震系於曹曾之下。

另外，林尊學自歐陽高，下傳平當、陳翁生。⁴⁶淵、津兩閣本皆未標示系連線，既不見林尊學有所承，亦不見平、陳同出一系，有失傳授圖意。而平當傳至桓榮，榮子桓郁、門人丁鴻各壯盛其學。桓郁傳子桓焉，以及楊震、朱寵三人；丁鴻傳楊倫、朱儀、陳弇、巴茂、劉愷五人。⁴⁷淵閣本兩系有別，桓焉、劉愷名字間隔，津閣本卻橫線系連八人，而上系連於桓郁，師承情況不確。

此世之下，尚有淵、津二本系連相同而可疑者：楊賜、（桓）典、黃瓊同世三人，縱線上系桓焉與劉愷，傳承關係混淆。⁴⁸

⁴⁴ 見明·朱睦㮮撰：《授經圖義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259。明·朱睦㮮撰：《授經圖》，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42。此姓名旁有黃霸，也許因此訛增，朱睦㮮書中已誤繫。

⁴⁵ 見明·朱睦㮮撰：《授經圖義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260、261。明·朱睦㮮撰：《授經圖》，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43、44。

⁴⁶ 見明·朱睦㮮撰：《授經圖義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261。明·朱睦㮮撰：《授經圖》，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44。

⁴⁷ 見明·朱睦㮮撰：《授經圖義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262、263。明·朱睦㮮撰：《授經圖》，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45、46。

⁴⁸ 據〈諸儒傳略〉桓典傳承家業，黃瓊師事桓焉，皆與劉愷無涉；而楊賜乃關西孔子楊震之孫，楊秉之子，傳授有序，楊賜又事桓焉，故傳授圖系於桓焉之下，家學之傳已未標示，又誤系於劉愷，失實更甚。見明·朱睦㮮撰：《授經圖義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263、264。明·朱睦㮮撰：《授經圖》，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46、47。

（四）三禮傳授圖（如【圖 6-1】、【圖 6-2】）

三禮義例有言「後儒以《儀禮》、《禮記》合為一書，今圖不更列《儀禮》。」⁴⁹因此，雖名為三禮，傳授圖並未按禮書三分，而是以高堂生一系圖示《儀禮》、《禮記》傳授，以劉歆一系圖示《周官》傳授。兩系之外，有徐生之派，蓋傳授者禮容，並非禮書。

此經傳授派系相對簡單，兩閣本間的出入也就不多，人名部分，略無差異，惟系連部分仍有疏漏。

劉歆三傳至馬融，淵閣本圖馬融下系延篤、鄭玄、盧植同世三人；津閣本馬融下失縱線，非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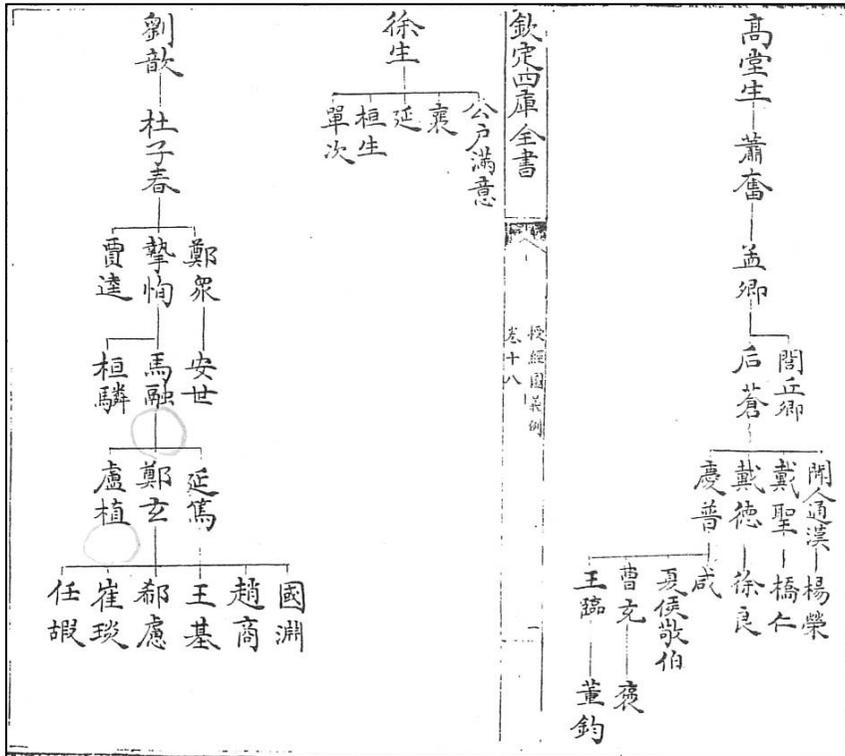
而延、鄭、盧三人與下一世國淵、趙商、王基、郗慮、崔琰、任嘏六人，兩世之間，淵閣本於鄭玄下縱線清晰，延篤下似有縱線而模糊；津閣本則盧植、鄭玄、延篤之下皆標示縱線。如此標示，傳授關係失之混亂。查索〈諸儒傳略〉，則國淵等六人皆承自鄭玄，⁵⁰則知盧、延之下縱線，都屬訛增。

瀏覽傳略，又可知《禮記》一系「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⁵¹，然則淵、津兩本授經圖中，聞人通漢縱線下系楊榮，皆誤；聞人與楊無授受關係，理應橫線連系楊榮、橋仁，並縱線上承戴聖；聞人通漢下縱線去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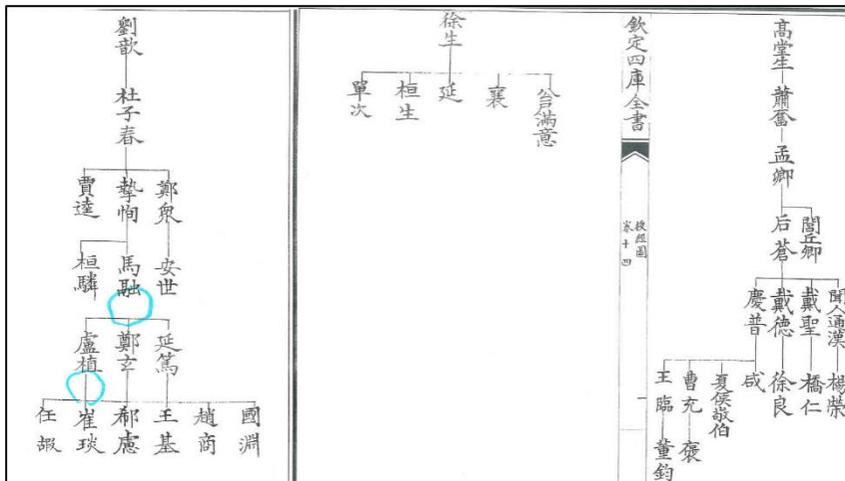
⁴⁹ 明·朱睦㮮撰：《授經圖義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314。明·朱睦㮮撰：《授經圖》，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56。

⁵⁰ 明·朱睦㮮撰：《授經圖義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319、320。明·朱睦㮮撰：《授經圖》，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61、62。

⁵¹ 明·朱睦㮮撰：《授經圖義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317。明·朱睦㮮撰：《授經圖》，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58。



【圖 6-1】



【圖 6-2】

（五）春秋傳授圖（如【圖 7-1】、【圖 7-2】）

《春秋》以三《傳》分作三系傳授圖，而漢代公羊學又有嚴彭祖、嚴安樂支派，亦獨立圖示。

人名部分，左氏系左丘明、穀梁系瑕丘江公，津閣本丘皆作「邱」，異體通用非誤。公羊系董仲舒弟子有段仲，津閣本作「段仲」；⁵²呂步舒，淵閣本誤作「呂不舒」。穀梁系蔡千秋傳尹更始，淵閣本誤書「尹始更」。

另外胡毋生三傳至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⁵³皆以《春秋》學顯於世，然淵、津兩本圖中一致誤作「睦孟」。嚴彭祖系四傳有段著，⁵⁴淵、津兩本圖中一致書作「段著」。

系連部分，左氏系虞卿授予荀卿、公羊系（公羊）壽授予董仲舒，淵、津兩本都失系連縱線，看似荀卿、董仲舒各自開派，非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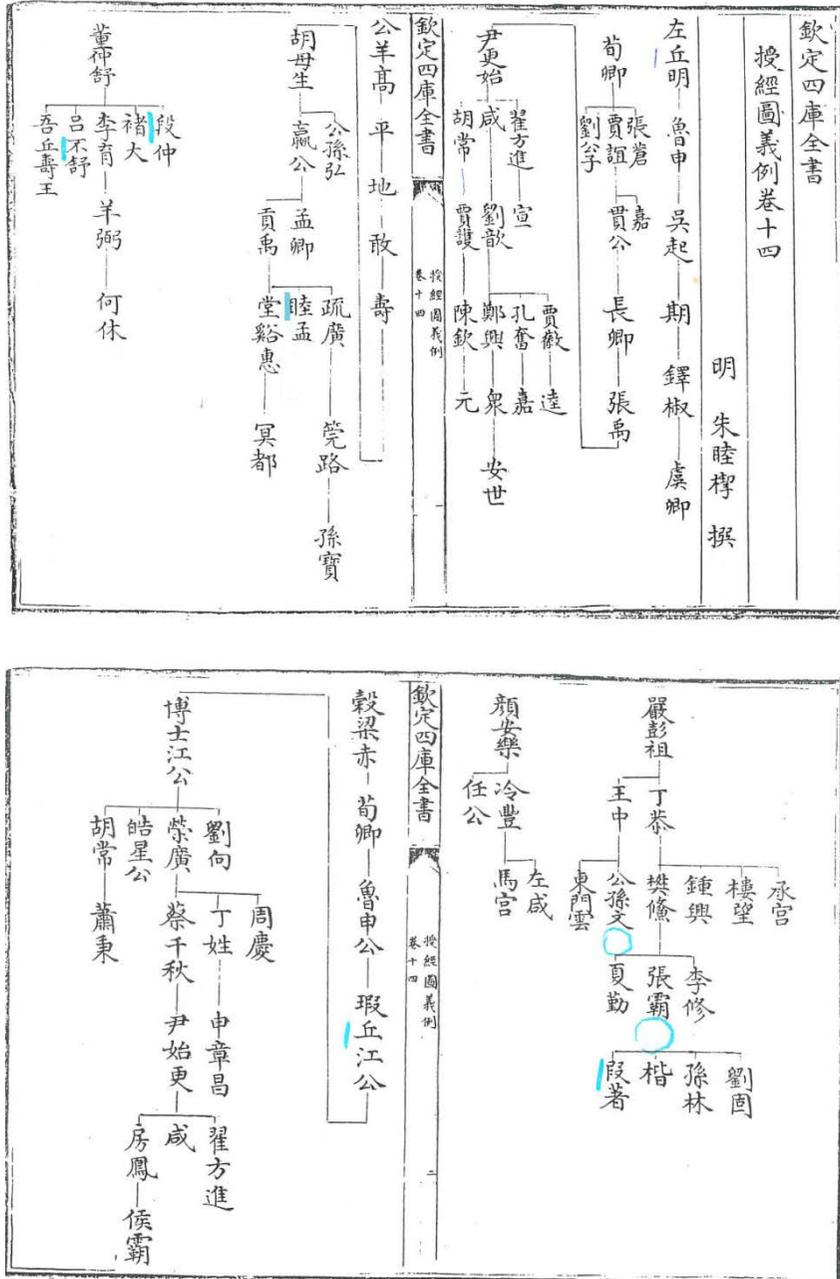
嚴氏學世系，公孫文、夏勤之間，淵閣本無縱線，是矣；津閣本則相系，混淆夏勤與李修、張霸同師於樊儵的清晰關係，實屬訛增。而張霸名下，津閣本縱線系連段著、（張）楷、孫林、劉固同世四人，是矣；淵閣本無縱線，上下失連，非是。⁵⁵

⁵² 淵閣本此經圖義例云：「段仲、般忠，舊圖為二人。《史記》徐廣注曰：『般作段，仲、忠聲相近，當是一人。』今圖從之。」原本有疑名，朱睦㮮引徐廣注定為段仲。見明·朱睦㮮撰：《授經圖義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290。段字，津閣本義例與世系圖皆寫作「段」，見明·朱睦㮮撰：《授經圖》，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75。明人編纂《萬姓統譜》，有段姓、假姓，而無段姓，今以淵閣本為正。明·凌迪知：《萬姓統譜》，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5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頁 775-778，上聲廿一馬韻無段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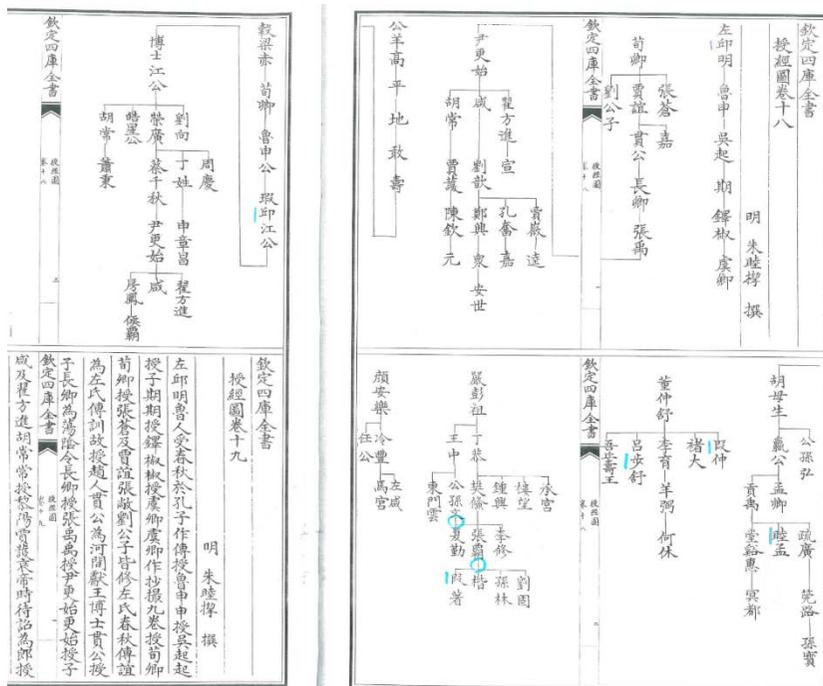
⁵³ 明·朱睦㮮撰：《授經圖義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294、295、296。明·朱睦㮮撰：《授經圖》，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81、82。

⁵⁴ 淵閣本張霸傳略，弟子有段著。明·朱睦㮮撰：《授經圖義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298。唯文津閣本仍作「段」，非是。明·朱睦㮮撰：《授經圖》，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83。

⁵⁵ 樊儵之傳授見明·朱睦㮮撰：《授經圖義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297。明·朱睦㮮撰：《授經圖》，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83。張楷為霸之仲子，傳承家學，段、孫、劉署名以就霸學。見上注。



【圖 7-1】



【圖 7-2】

四、存疑：文津閣本易經傳授的費派闕圖

上一節「易經傳授圖」的討論，因津閣本闕費直一系，故無從校對此系兩閣本的出入。然而，此處大有問題。

其一是：費高。淵閣本圖示費直傳王璜（義例作潢），王璜傳高相、費高同世二人；高相傳（高）康，費高傳毋將永。然而，次卷〈諸儒傳略〉載：

高相，沛人，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受之王璜；傳子康及蘭陵毋將永。康以明《易》為郎；永至豫章都尉。繇是《易》有高氏之學。⁵⁶

世系述說明確，高相傳與其子以及毋將永，如此，授經圖「費高下系連毋將永」顯然

⁵⁶ 明·朱睦㮮撰：《授經圖義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241。明·朱睦㮮撰：《授經圖》，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10、11。

錯誤。而且傳略中遍尋不見「費高」其人；搜尋《漢書》及經學史著作，亦未見漢儒有「費高」者。唯《漢書·藝文志》云：「及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⁵⁷或許製圖者讀此文獻，粗心忽略「二家」兩字，誤認有「費高」之人，從而在費直一系妄意安插位置。

其二是：所謂「文津閣本闕圖」，嚴格說來應是指：「文津閣複製本闕圖」。《四庫全書》今存各閣本，都屬國家級珍藏，非輕易可得而目睹，本文所據以討論者，只是 2006 年出版的影印複本。然而，影印複本複製過程中若有疏失，將不能如實反映原書，所以有此警覺，緣於津閣本《書》經傳授圖的「今文」半字。

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裝帙 1500 冊數的《文津閣四庫全書》，以四合一的方式縮印文津閣本。蝴蝶裝左右兩頁翻開的尺寸，大約等同原閣本書籍平展的一葉，在此尺寸內縮印原書的四葉，因此名之為四合一。《四庫全書》書葉規格統一，原書一葉平展，版心居中，每葉十六行，即版心左右半葉各八行。《授經圖》編印在《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此冊 40 頁為《授經圖》卷 10 整卷，縮印原書卷 10 的葉一、葉二上下排置。令人不解的是：葉一右半葉只七行半——第八行寬度不足。此行文字只標示《尚書》今文學的「今文」兩字，兩字左半（即第八行的左半）都像被裁刀切除（見【圖 5-2】）。這種半字，絕非刻意手寫，也不是文字被蟲蛀或破損，不可能是文津閣本的實況。

《文津閣四庫全書》有複製失真的問題，筆者曾為文討論。由於此一複製工程以不拆解原書為原則，採行數位攝影技術，攝影每一書冊的每一半葉，圖像造檔，再經轉化編輯處理。然而，「攝影圖像經數碼技術處理後，內容可以抓取填貼，圖像也可等比例縮小放大，方便編輯排版。但調整失準的情形時有所見，有焦距不對而字顯得模糊的，有比例縮得太小的，也有縮得不夠小的」⁵⁸

這，很能解釋為何《授經圖》卷 10 這半葉會是七行半、「今文」兩字會橫遭切割。出版單位設計了固定的每葉框架，在複製此半葉，抓填檔案圖像時，影像編輯調縮得不夠小，未能吻合框架尺寸，以致第八行的左半超出框架——可以想見：每行的行尾勢必也因過長而未能入框，如同被裁切，只是這一半葉沒有文字滿行者，所以行尾不見了複製者也未覺察。

明白《文津閣四庫全書》複製的方法，再回看《易》學傳授圖。費直一系，因非官學，沒有章句，所以別立一系。參照《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全書亦裝帙 1500 冊，同樣四

⁵⁷ 東漢·班固：《漢書·藝文志》，收入《仁壽本二十六史》（臺北：成文出版社，1971年），卷 30，頁 13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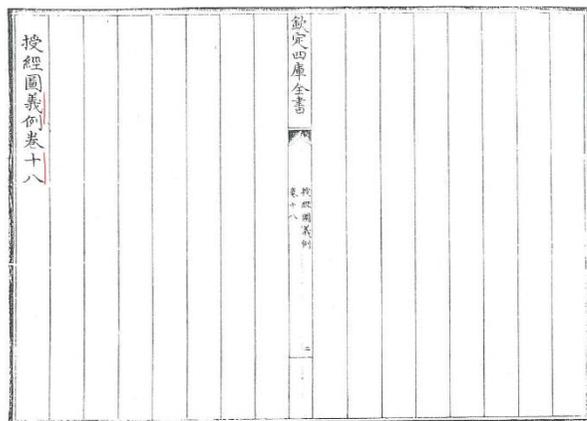
⁵⁸ 黃明理：〈新複製技術下的失真問題——以北京商務印書館《文津閣四庫全書》為討論對象〉，《書目季刊》第 53 卷第 1 期（2019 年 6 月），頁 1-42。

合一縮印）的圖示情形：

《授經圖義例》卷二為《易》學傳授圖，共二葉，第一葉主要為以田何為中心的源流分系，圖示漢代立學官的施、孟、梁丘、京房四家授受關係，世系層疊人物眾多，佔滿了全葉；而第二葉，唯有費直一系，四世六人，只占右半葉約四分之一葉面，其餘以及左半葉完全空白。《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以拆解原書逐葉展開影印方式進行複印，葉一、葉二內容份量懸殊的安排，是文淵閣本原書樣貌。由此以推文津閣本，它們的謄錄形式相去不遠——勢力懸殊的官學與民間之學分配在兩葉，必也是第一葉內容充滿，而第二葉疏疏宕宕。

疏疏宕宕的這葉，只占半葉四分之一篇幅的費氏易學，在《文津閣四庫全書》複製作業中，或許是拍攝存檔時，或許是取檔編輯時，⁵⁹很有可能因為不起眼，而被現代技術操作員忽略了，因此形成《授經圖》卷 10 闕費系傳授圖。

然而，因不起眼而被忽略，難道文津閣本謄錄時不會發生嗎？當然也會，但可能性較小。綜觀五經之傳授圖該卷，兩閣本都給予至少兩葉的空間，有如淵閣本《授經圖義例》卷 18，三禮的傳授圖，即使僅占一葉，但仍完整保留空白無內容的第二葉，該葉末行且有書名卷次字樣（如【圖 8】）。⁶⁰倘若文津閣謄錄時漏抄費系，該卷將只剩一葉，不僅謄錄者容易警覺全卷未竟，即使不慎漏謄了，也比較容易被檢核出來。兩相比較之下，目前所見津閣本《易》學傳授的費派闕圖，



【圖 8】

複製過程中出錯的可能性，要遠大於閣本謄錄失載。尤其現代技術的操作人員，他們對於古代文獻相對陌生，感情相對疏遠，每一半葉逐一取像存檔，工作當下不可能詳閱書籍內容，因而大量空白的葉面誤以為無資料而大意跳過，發生率絕對存在。

職是之故，若根據今日所見《文津

閣四庫全書》的情形，逕以為文津閣本漏

抄了費、高之授受圖，恐怕會有問題。在未能親見文津閣本原書的情況下，保留津閣本《授經圖》費氏易學有圖的想像，是必要的。

⁵⁹ 新複印技術不拆解原書，所以將原書的每一半葉，進行數位照相存檔，之後再轉為編輯形式填貼於固定的書籍框架中，形成近似影印的複本。參見黃明理上引文。

⁶⁰ 見明·朱睦㮮撰：《授經圖義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5 冊，頁 316。

五、結語

《四庫全書》纂修刪改謄校等方面的缺失，斷傷圖書品質，早有學者指證歷歷，提醒後學引用其圖書時必須有所警覺。⁶¹以上描述的兩閣本同書異貌情況，可以與學者們的評論相印證。不過，本文的目的與論點，卻不擬仍停在這基本已有的共識上；即使實際比較了同一書籍兩個抄本，也無意涉及文淵閣、文津閣高下優劣的評判。《授經圖義例》與《授經圖》孰是孰非不是重點，思索書名何以猶疑不定的緣由，毋寧更值得關注。

舉凡抄寫，筆誤難免，未再三細校者必定留下疏失。乾隆朝在不慢的進度下，相繼完成北四閣、南三閣《四庫全書》，主事者整齊文獻與推擴圖書功能的目的大致實現，整體而言，追求了效率，也犧牲了圖書品質。現存的文淵、文溯、文津三閣原本，書籍中多少遺留訛誤缺漏，是無可諱言的事實。引用時謹慎查考，避免傳訛可也，一味輕詆鄙視則失之太過了。而當時重複抄出多部，倒也提供彌補缺失的管道，畢竟透過不同抄本的互參，部分疏失是得以修正的。本文比較兩本《授經圖》過程中，某些筆誤因互勘即得以檢出，說明了複數抄本存在的基本價值。

然而手抄本的意義，不應僅止於書籍內容確誤的計較。尤其對照於印刷出版，每一手抄本都是「唯一」的特質，自有其珍貴性。況且，手抄書籍的存在，還附載著屬於那個時代特殊的文化習慣、讀書人的思維，值得已習慣面對印刷複製品的現代人，從抄本研究中去追索遺存的往日思維。

比如強調著作權的今日，人們習慣著作歸屬作者或編纂者，法律規章保障智慧財產，著作雖出版販售，但一式的內容不容他人剽竊、擅改，不容違背學術倫理加以引用。然而，憑藉手抄方式取得書籍的年代，抄寫者若是有見地的讀書人，抄副過程有意地勘誤、改動，以符合自我的理解，又低調地隱藏更動未明白標示，抄竟，書名作者不動的書籍多出一部——然而書內，讀者與原作的互動、原作對讀者的啟發，已直截呈現在略異於原著的文本上。若以讀書為學的角度衡量，這未必不好；對原著作傳遞的信息而言，也未必有害無益全然無功。雖然與現代著作權觀念格格不入，⁶²但在以手抄少量複寫的前提下，卻是無可斬絕、無可厚非的。

本文討論的朱睦㮮著作就是一個例子。《授經圖》，原只是見載於《崇文總目》的圖

⁶¹ 例如陳恆嵩：〈利用《四庫全書》治學時應注意的問題〉，收入《昌彼得教授八秩晉五壽慶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5年），頁105-128。

⁶² 有著作權保護的現代，抄寫複製出版品，未冒名頂替作者，未進行買賣，其實並不觸法。但除非有特殊動機，否則如此大費周章取得圖書的人少之又少，顯非大環境鼓勵倡導的行為。

書，書已亡佚，但書目與簡單的提要，卻開啟一系列的著述活動：先是章俊卿溯源宗派，擬重現其圖；接著，朱睦㮮因章氏舊圖而增訂，補充儒者傳略、經解書目，標幟《授經圖》之名付梓；再後，又有黃虞稷、龔翔麟，根據朱書抄本重為釐訂增補，刊刻出版，改書名為《授經圖義例》，作者則仍署朱睦㮮；最後乾隆編製《四庫全書》，收存黃、龔刻本，謄錄為諸閣抄本，而先後完成的閣本於書名、卷次且有變動，終於呈現為同書異名異貌的抄本。自朱睦㮮作序起算，洎至津閣本完校呈覽，互時兩百年（1574-1784），寫本付刻、刻本又抄，抄本刻本並行，其書內容並不固定，書名未盡貼切，作者也模稜兩可，然而整理圖書者卻不以為意，視若理所當然。這樣的現象，可說是手抄年代的文化特色，與一版化身千萬、作者書名緊密相連的現代圖書生產作業，大異其趣。

對照現代圖書出版，《授經圖》幾度翻刻重抄過程，著作權顯然未受到尊重。相反的，他們對修改前人書籍的寬容，「讀者本位」的心態卻表露無遺。就像章、朱、黃、龔等人，讀前人之書，尊重作者的意志並積極回饋心得新知，注入原著，藉以精實或周備書籍內容，不頂冒作者、不取名新作，舊瓶裝新酒以分享後人。動機很單純，圖書不視為某人財產，行為更貼近藉閱讀以「共學分享」的本質。其中蘊藏一種看待書籍的思維：書的完成，不在作者，而在能恰如其分接收書籍信息的讀書人這端。書籍，充其量只是媒介，作者透過書籍傳達的信息，假使讀者接收了，並受到啟發；或者，讀者別有相關信息，適足補充，因而反向修整圖書文字，維持甚至擴充知識傳播的量能——充分利用媒介物，其行為的合理性，何嘗落後於拘守著作權法而不敢擅動媒介一文一字的讀者呢？書籍的用，在此認真讀者的手上更臻完滿。

而「書完成於讀者」的思維，必也展現在：讀者面對書籍，於文本字句的訛舛具高度警覺性。手抄易生的各種訛誤舛錯，成為考驗，讀者一卷在手，即在接收與理解間，謹慎揣度一字一句合宜與否。

如能同情理解這樣的想法，當面對《四庫全書》抄本訛錯未淨，也就無需像乾隆帝那般動氣，計較書不完美。回歸讀者本位，耐心面對訛誤，會是更務實的讀書態度。即如《授經圖》傳抄差異偌大、圖示訛誤不曾少，依然可透過書中資訊、異本校勘，加上基本知識，逐一推敲檢正。只要謹慎以對，書中未淨的錯誤並不誤人。可貴的是，確實檢覈下，讀者思辯的機會更多，讀書目的也因而更落實。從這一角度看，不完美的《四庫全書》抄本，即使僅是複製本，儘管複製中潛藏變數，但何嘗不能造就美好的閱讀呢？

徵引文獻

古籍

- 東漢·班固 BAN, GU：《漢書》*Han Shu*，收入《仁壽本二十六史》*Ren Shou Ben Er Shi Liu Shi*（臺北 Taipei：成文出版社 Cheng-Wen Publishing Co.，1971 年）。
- 宋·王堯臣 WANG, YAO-CHEN：《崇文總目》*Chong Wen Zong Mu*，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ku Quanshu* 第 674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1985 年）。
- 明·王守仁 WANG, SHOU-JEN：《王陽明全集》*Wang Yang Ming Quan 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92 年）。
- 明·朱睦㮮 ZHU, MU-JIE 撰：《授經圖義例》*Shou Jing Tu Yi Li*，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ku Quanshu* 第 675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1985 年）。
- 明·朱睦㮮 ZHU, MU-JIE 撰：《授經圖》*Shou Jing Tu*，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Wen Jin Ge Siku Quanshu* 第 675 冊（北京 Beijing：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2006 年）。
- 明·何良俊 HE, LIANG-JUN：《四友齋叢說》*Si You Zhai Cong Shuo*（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97 年）。
- 明·凌迪知 LING, DI-ZHI：《萬姓統譜》*Wan Xing Tong Pu*，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ku Quanshu* 第 957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1985 年）。
- 明·陳繼儒 CHEN, JI-RU：《巖棲幽事》*Yan Qi You Shi*，收入《叢書集成簡編》*Cong Shu Ji Cheng Jian Bian* 第 222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1965 年）。
- 明·焦竑 JIAO, HONG：《澹園集》*Dan Yuan 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99 年）。
- 明·顧炎武 GU, YAN-WU 撰，徐文珊 XU, WEN-SHAN 點校：《原抄本日知錄》*Yuan Chao Ben Ji Zhi Lu*（臺北 Taipei：臺灣明倫書局 Taiwan Minglun Book Company，1979 年）。
- 清·永瑤 YONG, JONG、紀昀 JI, YUN：《欽定四庫全書總目》*Qin Ding Siku Quanshu Zongmu*（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1983 年）。
- 清·張廷玉 ZHANG, TING-YU：《明史》*Ming 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3 年)。

清·莫友芝 MO, YOU-ZHI:《宋元舊本書經眼錄》*Song Yuan Jiu Ben Shu Jing Yan Lu*, 收入《書目叢編》第 12 冊(臺北 Taipei:廣文書局 Kwangwen Book Company, 1988 年)。

清·錢大昕 QIAN, DA-XIN:《潛研堂集》*Qian Yan Tang 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9 年)。

近人論著

周予同 ZHOU, YU-TONG:《群經概論》*Qun Jing Gai Lun*(高雄 Kaohsiung:復文圖書出版社 Fu Wen Books Co. Ltd., 1989 年)。

金毓黻 JIN, YU-FU:《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閣四庫全書提要》*Jin Yu Fu Shou Ding Ben Wen Su Ge Siku Quanshu Ti Yao*(北京 Beijing: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 China National Microfilming Center for Library Resources, 1999 年)。

張升 ZHANG, SHENG:《四庫全書館研究》*The Research of Siku Quanshu Guan*(北京 Beijing: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2012 年)。

張書才 ZHANG, SHU-CAI 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Archives of the Compilation of Siku Quansh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97 年)。

張其昀 ZHANG, QI-YUN 等編:《清史》*Ching Shi*, 收入《仁壽本二十六史》*Ren Shou Ben Er Shi Liu Shi*(臺北 Taipei:成文出版社 Cheng-Wen Publishing Co., 1971 年)。

陳恆嵩 CHEN, HENG-SONG:〈利用《四庫全書》治學時應注意的問題〉“Problems tha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when using *Siku Quanshu* to study”, 收入《昌彼得教授八秩晉五壽慶論文集》*Essays on Honor of Professor Bi De Chang's Eighty-fifth Birthday*(臺北 Taipei:臺灣學生書局 Taiwan Student Book Co. Ltd., 2005 年), 頁 105-128。

黃明理 HUANG, MUNG-LI:〈文淵閣本《四庫全書》臚繪人名錄與辨析〉“An Analysis and Scribe Roster of the Wen Yuan Pavilion Si Ku QuanShu”, 《中國學術年刊》*Studies in Sinology* 第 36 期春季號(2014 年 3 月), 頁 45-92。DOI: 10.6238/SIS.201403.03。

黃明理 HUANG, MUNG-LI:〈新複製技術下的失真問題——以北京商務印書館《文津閣四庫全書》為討論對象〉“Distortions as a Result of New Duplication Techniques in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Publication of the Wenjinge Sikuquanshu”, 《書目季刊》*Bibliography Quarterly* 第 53 卷第 1 期(2019 年 6 月), 頁 1-42。DOI: 10.6203/BQ.201906_53(1).0001。

Shoujingtu* or *Shoujingtuyili*: Transcription Differences in the Research on the Origins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Wenyuange* and *Wenjinge* versions of the *Siku Quanshu

HUANG, MING-LI

(Received September 30, 2021 ; Accepted January 9, 2022)

Abstract

There are 20 volumes of *Shoujingtu* (授經圖) written by Zhu Mujie (朱睦㮮, 1552-1587, Ming Dynasty) in the *Shi* (history) section of the *Siku Quanshu* (四庫全書). Although the authorship of this book is credited to Zhu Mujie, Huang Yuji (黃虞稷, 1629-1691) and Gong Xianglin (龔翔麟, 1658-1733) also made significant additions to it. As a result, the contents are no longer the same as the original work authored by Zhu.

Because *Shoujingtu* has groundbreaking meaning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Five Classics, the compilers of the *Siku Quanshu* affirms this value of this book; however, the book's contents do not exactly match with the book named *Shoujingtu*. This is in part because it has been copied several times by hand; moreover, the editors had different perceptions towards the same book. Hence, the title of the book as well as the content of each volume are inconsistent in the *Wenyuange* (文淵閣) and *Wenjinge* (文津閣) versions in existence today.

The focus of this article is not to compare the merits and flaws of these two versions, but to consider why the process of compilation and copying resulted in the error of creating multiple

books that appear different but have the same contents. Furthermore, it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apparent lack of importance given to maintaining the original name of the work. Why was it not considered strange to greatly alter the contents of a book and yet maintain its original title and attributed author? Additionally, errors are inevitably present due to the lack of meticulous oversight of the copying process. Accordingly, the *Chuanshoutu* (傳授圖) section, which is the focus of the *Shoujingtu*, contains different transcription errors in the two versions of the *Siku Quanshu*. Apart from criticizing the quality of the transcription, can this be considered positively?

It is the opinion of this article that adopting a reader-oriented attitude is key; thus, correction and supplementation in the transcription process can be regarded as the contributions of individual readers participating in the completion of the book in the era of hand-copying and dissemination. If readers today can adopt this attitude in understanding and accepting the transcription errors present in the *Siku Quanshu*, an enjoyable reading experience can be had, even if one is reading a photocopied version.

Keywords: hand-copying and dissemination, *Siku Quanshu*, multiple books that appear different but have the same contents, *Shoujingtu*, reader-oriented.